

雅俗之間：魯迅與張恨水的女性書寫與主體性分析

【韓】薛熹禎*

摘 要

在中國的歷史長河中，女性不僅是推動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而且其自身的生存狀態與命運抉擇亦成爲時代變革的縮影，印證著那個時代獨有的歷史記憶。在現當代文學史上，魯迅與張恨水均通過自己的作品表達了對女性問題的關注與思考。對於魯迅，其將筆墨聚焦於封建禮教對女性的奴役與壓迫，以改造國民性的視角，鞭撻舊社會的黑暗與腐朽；而對於張恨水，其創作表現出女性在爭取自身解放的同時，又被社會桎梏所俘獲，受壓迫者與壓迫者的雙重身份最終導致破碎人格的形成，揭示出「弱者的反抗對象不是指向強者，而是指向更弱者」這一殘酷的現實。從創作者自身的角度出發，魯迅身爲啓蒙思想家，其創作多是從男性視角，以自省和懺悔的精神反思男權社會給女性帶來的不幸，並將造成她們生存現狀的原因歸結於愚昧的封建思想和腐朽的社會制度。相較之下，張恨水重點關注女性的瑣碎生活，並據此剖析女性奴性心理形成的原因。通過對生活細節的描繪，從平視的角度，走入女性內心，結合發生在社會和家庭內部的種種事件，反思女性的生存現狀和宗法父權社會的吃人本質。

關鍵詞：魯迅、張恨水、雅俗之辨、性別視角、不同聲音、主體性

* 薛熹禎（1978.1-），女，韓國首爾人，中國現當代文學博士，現任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韓國（朝鮮）語言文化系長聘外籍教師，主要研究方向：中韓現當代文學、中韓著作翻譯。

Between the Elegance and the Vulgar: Lu Xun and Zhang Henshui's Female Writing and Subjectivity Analysis

Sul, Hee-Jung*

Abstract

In the long history of China, women were not only an important force to promote social progress, but their own living conditions and fate choices also became the epitome of the era's transformation, which consolidated the unique historical memory of that era.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both Lu Xun and Zhang Henshui expressed their concern and reflection on women's issues through their works. The works of Lu Xun focused on the slavery and oppression of the feudal ethics code to women, in order to transform the national perspective and chastise the darkness and decay of the old society; whereas the works of Zhang Henshui showed that while women were fighting for their own liberation, they were constrained by the shackle of the society. Their dual status of the oppressor and the victims tortured by oppressors, eventually led to the broken personality, revealing the cruel reality that the weak's rebellious object is not the strong, but those who weaker. From the author's own perspective, Lu Xun is an enlightenment thinker, whose works were mostly from a male perspective, reflecting on the misfortunes brought to women by the patriarchal society in the spirit of introspection and repentance, and attributing the reasons for their living status to the ignorant feudal thoughts and corrupted social systems. In contrast, Zhang Henshui focused on the trivial life of women and according to this, analyzed the reasons for the formation of women's servile psychology. Through the portrayal of the details of life and from the equal perspective, he entered into women's heart, combined various affairs occurring in society and family, and reflected on women's living status

*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nd the nature of exploitation of the patriarchal society.

Keywords: Lu Xun, Zhang Henshui, Distinction between elegance and vulgarity, Gender perspective, Different voices, Subjectivity



雅俗之間：魯迅與張恨水的女性書寫與主體性分析

薛熹禎

中國的近現代史，是一個滿溢著屈辱悲苦的時代，伴隨著潛伏後的犧牲與抗爭，在時局不停動盪的前行中，社會制度和民眾生活也在發生激烈的變革。在這一背景下，文學創作者敏銳體悟人世間的悲歡離合，通過自己的作品表達對國家、民族、民眾命運的批判與關懷。在中國文學對社會人生的各種探索中，以魯迅、張恨水為代表的不同文學創作群體，從各自的視角出發，摒棄無動於衷的冷靜旁觀，反對忘卻自身存在去追求所謂「美」的體驗，從自己內在的困境出發來觀察社會、探尋人生真諦。由此觀之，在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和方法背後，是共同的社會責任感和直面人生的勇氣，即他們始終「以各自的人生觀與文學觀對自己從事文學事業有所追求，以自己的敬業精神為自己的文學信仰奮鬥不息」¹。

一、啟蒙與描繪：不同視域下的雅俗文學創作實踐

「雅俗文學」作為文學現象一直備受學界關注，雖然代表作家作品廣為人知，但對於「雅」、「俗」如何界定，以及由此衍生出的相關問題，學界至今尚無全面明晰的答案。縱觀現當代文學史，雅俗之爭自「五四」以來便從未停歇，其中尤以 1919 年、1923 年的兩次論爭影響最為廣泛。筆者認為論爭之發端，多是由於人們在探求雅俗之辨的過程中，往往將關注點聚焦於兩者的差異，卻忽略了其內在的一致性和互補性。從發展的觀點來講，「文學觀念是不斷地向未來開放的。我們今天替雅俗文學下個定義，明天是否被未來的文學作品和文學觀念所拋棄甚至嘲弄？」²靜觀新文學作家，其作品重在對社會制度的批判，借此給讀者以人生的

¹ 范伯群：〈俗文學的內涵及雅俗文學之分界〉，《江蘇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4 期（2002 年 12 月），頁 33-39。

² 朱國華：〈論雅俗文學的概念區分〉，《文藝理論研究》第 4 期（1996 年 8 月），頁

啓迪；而通俗文學則從辛亥革命以來的社會現實爲依託，採用「照樣實錄」的方法，貼近民眾生活，深入家庭內部，並由此描繪百姓的衣食住行，挖掘各類社會現象的成因。由此，雅俗之辨確有各自的創作特點，但表面的分歧，實則是對反映時代、啓迪民智的互補，是以兩種不同的角度和範疇，共同完成對那段特殊歷史時期的記錄。現實的創作實踐也證明，相互滲透、相互磨合日漸成爲雅、俗兩大文體的總體趨勢，即「對立消解，矛盾雙方向對立面做有限度的轉化，雅者趨俗，俗者趨雅，雙方靠近、融合，彼此取長補短，並在雅俗結合的基礎上，誕生了一些新的小說類型。」³作爲文學大家，魯迅與張恨水在各自的創作領域均作出了突出貢獻，其作品中的人物、意向以及創作視角，作爲雅俗文學領域的代表一直備受關注，爲我們帶來很多啓發。

20 世紀 20 年代，魯迅作爲新文化運動的宣導者和實踐者，是當時中國先進知識份子的典型代表。在新舊巨變的歷史背景下，魯迅複雜的精神世界不僅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與中國現代化的深刻衝突，同時也展現了一代人對現代文明將走向何方的困惑，其深刻之處在於「代表了他時代的理想，卻又表達了這種理想的困惑。魯迅沒有試圖用簡單化的方式解決它所面臨的一切問題，相反，面對複雜的世界，他努力使自己也變得複雜起來」⁴。通過對社會現實的深刻批判，魯迅以震撼人心的方式與讀者產生共鳴，促使讀者反思所謂「傳統」和當時的現實生活。借助作品和其中的人物形象，我們能真切觸摸到魯迅那顆苦痛彷徨的心靈。一如著名哲學家李澤厚所言：「魯迅不是以寧靜的學者，甚至也不是以單純的戰士的身份，而是以他的全部活生生的靈魂來從事他的探討。」⁵這就是他的親身經歷恰恰是魯迅爲什麼超越了 20 世紀與他處於同一時代的同志的原因。⁶

同時期的中國文壇，張恨水在相同的歷史背景下，以豐碩的通俗文學創作成果，描繪了普通民眾的生活百態。縱觀張恨水的人生經歷和文學作品，不難發現其內心的複雜與矛盾：既擁抱社會變革所帶來的新風氣、新思想，又感懷傳統文化統禦下的社會理念。面對新舊文化的衝突，以及道德價值觀念的顛覆性變革，

6-14。

³ 孔慶東：《超越雅俗》（重慶：重慶出版社，2008 年），頁 141。

⁴ 汪暉：《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 年），頁 14。

⁵ 汪暉：《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頁 14。

⁶ 李澤厚：《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 年），頁 449。

張恨水內心充滿了緊張複雜的情感。其《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八十一夢》、《巴山夜雨》無一不是內心「困惑」的表達與書寫。需要強調的是，此種「困惑」作為一種由作者向讀者延伸的文學體驗，在本質上屬於追求新舊調和而未得的悖論狀態，即中國文化中的中庸和諧之道，宣導人們追求人與自然、個體與社會以及新舊思想文化之間的內外統一，但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對民眾甚至包括文學實踐者自身而言，都是極難實現的。由此，困惑便油然而生，表現為作者親切、體貼、惆悵，對人生帶有哲學意味的深思默想，以及熱愛人生、隨時準備飄然而行的創造性思維，諸如此類便構成了張恨水在文學創造中的重要內心特徵。

在當時的現實生活中，除了魯迅每天晚上為其母念張恨水的小說以外，魯、張兩位大家並無交際。但兩者作為不同陣營的領軍人物，其對時代的反映、對民眾的啓迪卻具備內在一致性。我們今天研究兩位大家的文學創作，根本之意在於探求兩位傑出人物在相同的歷史背景下，如何形成特立的人文品格，如何走向不同的文學創作之路，以及社會文化變革之於兩位大家有何影響。同時，借由差異的複雜性與矛盾性的比較，我們亦可探討知識份子產生內在矛盾的原因，並將以為代表的魯迅、張恨水同時代知識份子，對待傳統與現代化的不同態度作為反思中國現代化進程反反復復的重要起點之一。⁷

二、解放與書寫：女性問題在文學實踐的深刻表現

回顧歷史，中國女性的命運與中國社會的變革存在深刻複雜的聯繫。「中國傳統社會的集權政治建立在封建宗法制度的根基之上，而宗法體制最根本的特點，就是以家族血緣關係為紐帶無情扼殺家庭成員的個人意志，將無條件的服從作為處於弱勢地位的婦女、兒童們天生的義務。」⁸在中國，男性在「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社會秩序及「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思維邏輯中，建立了至高無上的身份和地位。因此，在封建思想和農耕社會經濟背景下形成的「男尊女卑」的性別等級制度和社會意識，是阻礙中國女性解放、妨害其掌握自身命運的關鍵之所在。作為早期先進知識份子的梁啟超，曾鮮明表達過對傳統文學

⁷ 薛熹禎：《現代與傳統視域中的雅俗之辨——魯迅和張恨水》（北京：北京大學博士論文，2014年），頁4。

⁸ 王瑞：《傳統與現代的徘徊——魯迅胡適文化心理比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頁238。

或「婦女文學」的態度：

古之號稱才女者，則批風抹月，拈花弄草，能為傷春惜別之語，成詩詞集數卷，斯為至矣。若此等事，本不能目之為學，其為男子，苟無他所學，而專欲以此鳴者，則亦可能指之浮浪之子，靡論婦人也，吾之所謂學者，內之以拓其心胸，外之以助其生計，一舉而獲數善。⁹

梁啟超關於傳統文學與女性問題內在聯繫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諸如胡適、魯迅等「五四」時期的領軍人物。鑒於當時國內外政治鬥爭形勢和民族救亡圖存的現實需要，「五四」時期的文學實踐者往往將社會問題與革命形勢聯繫起來。對於當時深受封建禮教壓迫的大多數女性，《新青年》從創刊之日起，就旗幟鮮明地反對封建禮教，宣導婦女個性解放，引導社會關注女性群體及她們的生存境遇。從魯迅日本留學歸國後發表的第一篇論文〈我之節烈觀〉起，到《隨感錄》系列第二十五、四十、四十九篇，再到〈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娜拉走後怎樣〉〈寡婦主義〉〈紀念劉和珍君〉〈以腳報國〉〈關於女人〉〈關於婦女解放〉《上海的少女》〈男人的進化〉〈病後雜談〉〈病後雜談之餘〉等雜文，其通過作品努力塑造新的社會文化人格。與此同時，「對於男性所確立的這種制度化的非人道性進行追問，便成為魯迅啟蒙敘事的重要部分。」¹⁰

放眼世界婦女解放運動，西方以女權運動為典型代表，發起者及鬥爭主體主要為女性，矛頭則直指男權制度對女性的束縛。但是，中國的婦女解放卻與之不同，其首先是由男性知識份子提出，並在其支持和推動下逐步實現女性自身的解放。其實無論哪種方式，在「共同人性」基礎上建立起的對男性、女性社會權利的普適認同，是社會現代化的重要標誌。「『五四』、『人的發現』的一個重要實際就是認識到女性與男性一樣的也是『神性加魔性』、『靈肉一致』(周作人語)的人，從而奠定了兩性互相理解、相互溝通的思想基礎。」¹¹從魯迅的作品觀之，其集中批判了以傳統貞操觀念為代表的舊道德對個人主體性的蔑視，揭露了封建宗法社

⁹ 梁啟超：〈論女學〉，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變法通議》（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頁30。

¹⁰ 馮奇：〈服從與獻身——魯迅對中國女性身份的批判性考察〉，《魯迅研究月刊》第10期（1997年10月），頁27-33。

¹¹ 李玲：《中國現代文學的性別意識》（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頁20。

會「三綱五常」、「節烈」、「孝道」等觀念的吃人本質。關於婦女解放運動中存在的問題，魯迅在〈祝福〉、〈在酒樓上〉、〈明天〉、〈離婚〉、〈幸福的家庭〉、〈孤獨者〉、〈傷逝〉等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被侮辱與被壓迫的女性。〈傷逝〉的子君是男性啓蒙話語下解放出來的新女性，她喊出了「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¹²的戰鬥宣言；勇於擺脫封建禮教的束縛與涓生結合，最終卻在「無愛」的人間死去。如果說子君走出家庭的失敗，暗示了男性啓蒙話語的不徹底性以及女性解放的艱難處境，那麼〈離婚〉的愛姑則是將封建家庭的利害鬥爭視爲生活的常規，總是幻想以封建制度來懲罰她的婆家，以便獲得「暫時做穩了奴隸」的地位。」無所不在的封建權力關係，依然枷鎖般地緊緊束縛著女性的思想和軀體。在這種權力關係下，婦女既沒有自主的選擇權利，更不可能具備獨立不倚的表達權，她們的思維要由男性和權力的體現者來主宰。婦女做的只能是服從——對於權威的一種下意識的服從。」¹³因此，愛姑並沒有推翻封建統治秩序的想法。相反，她是以封建方式來反封建的，這就使她逐漸陷入了一個歷史的怪圈。正如戴錦華所分析的：「作者塑造這些女性人物並不是要給你留下一個難忘的發人深思的性格審美形象，而是爲了以她們的苦難印證封建歷史的非人性，再現社會的罪惡，而以她們的麻木來襯托這罪惡的不可歷數。在某種意義上，她們的肉體、靈魂和生命不過是祭品，作品的擬想作者連同擬想讀者，都在她們無謂無聞無嗅的犧牲中完成了對歷史邪惡的否定和審判。」¹⁴愛姑把自我人格的實現寄託於對男性的依附和糾纏上，實際則表達了她強悍外表下不堪一擊的奴性心理。「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兒性；無妻性。妻性是逼成的，只是母性和女兒性的混合。」¹⁵借助新文化運動，傳統貞操觀被部分年輕人所摒棄，當時的多數民眾尤其是女性，對新觀念下的「自我想像」正逐步構建。雖然新理念在實際社會生活中尚未獲得主導地位，但在新一代知識份子群體中已被廣泛接受：「現在一般人……先戀愛後結婚成爲普通的信念。」¹⁶

¹² 魯迅：〈傷逝〉，《魯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頁115。

¹³ 馮奇：〈服從與獻身——魯迅對中國女性身份的批判性考察〉，《魯迅研究月刊》第10期（1997年10月），頁27-33。

¹⁴ 戴錦華、孟悅：《浮出歷史地表》（北京：中國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頁25。

¹⁵ 魯迅：〈而已集·小雜感〉，《魯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頁555。

¹⁶ 葉聖陶：〈過去隨談〉（1930年10月29日），見劉增人、馮光廉：《葉聖陶研究資料》（北京：北京十月出版社，1988年），頁119。

值得關注的是，由於牽涉到現代性話語的內在矛盾，除個別作品外，魯迅的大多數小說中，女性並不是故事的主角。作品中的人物亦常常陷入生活的困境、婚姻的不安以及愛情與事業的對立之中，作品敘述的重心已逐漸擺脫那個時代的男性敘述固有的範圍。雖然在魯迅的作品中，女性仍處於社會的邊緣、是被虛化的一個符碼，但是，魯迅是善於審己的，通過對男性啓蒙者深層意識的自我批判其「以一種男性意義投射出來的，繞開女性的內在本質和精神立場的女性觀」¹⁷，試圖為現代女性打開一個真正能夠實現人生價值的新空間。

三、轉型與表達：對女性解放現實出路的思考與探尋

20 世紀 20 年代，國家與社會時局的轉型，為包括女性內在的所有人帶來了新問題。但是，處於歷史劇變中的女性群體，其自身發展面臨著多重困境，具有不同於男性的特點。她們在現實生活中的困惑與迷茫，實質上是對自身如何存在以及未來怎樣發展的追問。對此，李小江曾分析稱：「中國女人不是一個‘問題群體’，而是一個在『問題』的壓力下覺醒的群體。」¹⁸由此觀之，中國女性的成長是時代重壓的產物，在多種因素的推動下，當時的中國女性從關注生活中的瑣碎事務，逐漸轉向對自身命運成因的探討，並對阻礙其個性解放和發展的制度提出質疑與挑戰。作為與魯迅同時代的文學大家，張恨水也從不同角度，描寫了現代女性所面臨的多種生存困境，即由於父親的缺席或家境的極端貧寒，她們被迫放棄了婚姻自主權，折射出部分中國女性在「嫁得好」與「幹得好」之間、在家庭和社會之間、在傳統與現代形象之間、對自力更生與「女人味」之間無所適從，進而導致破碎人格的形成和人生悲劇的發生。在實際創作中，張恨水通過人物形象表現了女性群體對自身存在及未來發展的反思，借由女性對自身認知程度的提升，尋找走出困境的有效途徑。

面對時代大潮，張恨水敏銳地認識到「新女性們」身處於新舊價值觀念交織衝突的社會，傳統價值體系、生活模式、社會結構漸趨崩潰。特別是部分接受過西方教育的女性，她們堅持以獨立的人格面對生活，以自由的態度面對婚姻與愛情，其言行不再受封建規矩的束縛，心智堅定地與舊道德、舊文化決裂，在其身

¹⁷ 戴錦華、孟悅：《浮出歷史地表》，頁 41。

¹⁸ 李小江：《女性／性別的學術問題》（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5 年），頁 153。

上不再見受封建奴化教育侵染的傳統女性的影子，精神風貌發生了顛覆性的變化。

〈現代青年〉中的孔令儀欣賞年輕漂亮的鄉下青年周計春，用金錢討好他，給他租高級房子、做新西服、給他買金表鏈子、自來水筆。〈啼笑因緣〉的何麗娜一次賞給為她取衣服的西崽就是二元小費，一年要穿幾百元的跳舞鞋子，一年的插頭花用一千多元。〈似水流年〉的培大校花米錦華花了許多金錢，送給黃惜時自來水筆、戒指、赤金的粉匣等奢侈品。她剛入大學就與許多追她的男生交往，與黃惜時戀愛同居，又主動與之分手。通過對新女性身婚戀觀念變化的描繪，我們得以窺見其內心理念的變革，即不再認同傳統倫理體系中的「節婦」，更不會允許自己淪為「棄婦、怨女」，她們堅定地選擇自己喜歡的對象，主動考慮是去是留，清醒地掌握自己的命運，「她要自己思考，自己做決定，並且用自己的雙手以自己的能力開闢自己的前途。」¹⁹她們是構建於「現代意識」之上的「靈肉一致」的獨立女性，男性的好惡、傳統的左右不再是其行動的出發點，她們擁有主體性的思考，立足於自身感受，尊重並行使自己作為女性的權利。由此觀之，她們的「新」是有內而外的，是真正意義的女性意識的覺醒。

回顧 20 世紀 20 年代的文學創作，「出走的娜拉」為很多人樹立了精神的標杆。娜拉們的「出走」有雙重含義：對於生命的個體來說，她們是依著「自由意志」而行動，「我務必努力做一個人」²⁰，同時也意味著與父權意識形態的決裂，即為「為人與為女的雙重自覺」做了鮮活的注釋，並由此為當時的先進知識份子所追捧。事實上，因當時特殊的歷史背景和社會環境，中國女性的解放與民眾「人性」的解放幾乎是同時提出的，這種現象「固然縮短了西方婦女那樣漫長的醞釀等待期，但也使女性覺後的路格外曲折漫長，使她們常常承受夢醒後無路可走的悲哀」²¹。現實中，在生活困境和壓力面前，女性堅持自身的獨立與解放是要有相應前提的，即需要依靠其具備的「本領」解決基本的生存問題。因此，張恨水十分關注女性教育與謀生本領的培養，並通過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就魯迅對女性出路的「二元論」，提出走「第三條路」的觀點。《春明外史》中的李冬青是位頗具獨立思想和反抗精神的才女：

¹⁹ [美] 許煒光，薛剛譯：《宗族·種性·俱樂部》（北京：華夏出版社，1990 年），頁 3。

²⁰ 胡適：〈易卜生主義〉，《新青年》第 4 卷第 6 號（1918 年 5 月）。

²¹ 劉思謙：〈中國女性文學的現代性〉，《文藝研究》，第 1 期（1998 年 1 月），頁 90-101。

這個女學生，原是庶出的，父親在日，是個很有錢的小姐，後來父親死了，嫡母也死了，她就和著她一個五十歲的娘，一個九歲的弟弟，靠著兩位叔叔過日子。……無如她那兩位孀母，總是冷言冷語，給他們顏色看。這女學生氣不過，一怒脫離了家庭，帶著母親弟弟，另外租了房子住了。她母親手上，雖然有點積蓄，也決不能支持久遠，她就自告奮勇，在外面想找一兩個學堂擔任一兩點鐘功課，略為補貼一點。無如她只在中學讀了兩年書，父親死了，因為叔叔反對她進學校，只在家裏看書，第一樣混飯的文憑就沒有了。²²

李冬青可謂是「五四」版的娜拉，在現實困境面前，她不僅沒有自怨自艾，而且依靠自身的知識和修養成爲一名家庭教師，並以此養活自己，承擔起了家庭的責任。其以一己之力解決了基本的生存問題，以經濟的獨立支撐起精神上的自主自強，並堅決反抗男權社會的權威。除此以外，《金粉世家》中的冷清秋靠寫對聯來謀生；《天河配》中的白桂英會唱戲，並以此養活家人；《燕歸來》中的楊燕秋不僅受過新式教育，還以自己的本事爲國爲民服務，她們均是張恨水心目中走出第三條路的「娜拉」。

張恨水爲自己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賦予了能夠獨立生存的技能 and 資本，使他們即便脫離了男性，也能夠實現自身的發展。張恨水筆下的女性在出走之後，既沒有墮落也沒有回去，而是獨立自尊地生存了下去。因爲她們可以憑自己的本領取得生活物資，以堅強的品質來克服謀生的苦難。因此，張恨水從經濟的角度重新審視兩性關係。從這一點看，金錢在婚戀中的支配作用，既是資本主義倫理觀對封建禮教的一種衝擊，也是對經營現代啓蒙婚姻的一種超越。總之，張恨水筆下的女性形象，既不同於雅文學作家塑造的激烈感性的新青年，也不同於一般男性作家筆下麻木不仁的農村婦女。換言之，她們既對現實保持清醒，又爲溫飽問題計量，有自己的尊嚴，也有些許虛榮，但其最大的特點在於能正視現實。這既不同於爲了革命理想而離家出走的狂熱女性，也不是爲了尊崇禮教而麻木隱忍奴隸般的女性。因此可以說，她們是活在當下的一群有血有肉的俗人群體。她們的文化心理、道德理念、悲喜人生以及日常生活，在一定程度上更能代表歷史轉型時

²² 張恨水：《春明外史》（上）（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1993年），頁373。

期女性的現實狀態。

四、結語

從創作實踐來看，魯迅和張恨水均認同對女性開展教育，提高其文化知識水準，相信只有具備謀求生存的本領，才可以走出一條自立自強的新路。魯迅在〈關於婦女解放〉一文中指出，傳統女性的經濟權沒有獨立，她們只能無奈的依附於男性，否則便無法生存，而正是這樣的現狀使社會價值的平衡更進一步地向男性傾斜，即女性的個性解放如果沒有經濟上的獨立，就無法擺脫「被養」這樣低賤的命運：

在沒有消滅「養」和「被養」的界限以前，這歎息和苦痛是永遠不會消滅的。在真的解放之前，是戰鬥。但我並非說，女人應該和男人一樣的拿槍，或者只給自己的孩子吸一只奶，而使男子去負擔那一半。我只以為應該不自苟安於目前暫時的位置，而不斷的為解放思想，經濟等等而戰鬥。解放了社會，也就解放了自己。但自然，單為了現存的惟婦女所獨有的桎梏而鬥爭，也還是必要的。²³

在封建時代，因為宗法制度的原因，男性在社會上居於絕對優勢的地位，而女性則受「三從四德」的束縛，社會地位極為低下。「五四」之後，在新思潮的衝擊下，很多作家開始關注女性的命運及社會地位等問題。魯迅「立人」的思想包含了對婦女解放前途的思考，激發了近代知識份子對封建文化和國民劣根性更徹底的思考。張恨水也看到了中國女性仍就處於受壓迫、受歧視的邊緣狀態，看到了女性解放僵化的現實。對女性命運更深層的思考貫穿著二人文學創作的始末，在女性書寫這一創作主題上魯迅和張恨水是一致的。張恨水在繼承魯迅人性批判思想的同時，對男性話語進行了徹底顛覆。其對待女性問題所採取的態度和視角，與肩負著民族啓蒙大任的魯迅還是有所不同的。

張恨水指出：弱者的反抗對象不是指向強者，而是指向更弱者。〈啼笑姻緣〉

²³ 魯迅：〈南腔北調集·關於婦女解放〉，《魯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頁615。

中的沈鳳喜、〈藝術之宮〉中的李秀兒、〈小西天〉中的朱月英在不斷追求人性解放的同時，又將其他女性設置為奴隸，最終在被壓迫和壓迫別人中形成破碎的人格。而魯迅是以一種男性視角看待女性社會地位低下的問題。「實際上，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到現在還如此，然而下於奴隸的時候，卻是數見不鮮的。」²⁴

從父系社會開始，女性確實沒有擺脫「第二性」的問題，長期處於依附地位，同時為了進一步加強男性特權，統治者不斷禁錮女性的思想和行爲。女性爲了生存，不得不屈服於男性的統治之下。但是，我們不能忽視維持生計對精神生活的決定作用。久而久之，她們認同了這種殘害女性的社會制度，甚至成爲這種畸形制度的辯護者。因此，傅立葉在《經濟和協作的新世界》中說，「某一歷史時代的發展總是可以由婦女走向自由的程度來決定，因爲在女人和男人、女性和男性的關係中，最明顯不過的表現出人性對獸性的勝利。婦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社會解放的天然標準。」可見，古往今來，婦女在專制統治下，一直受到禁錮，婚姻也不自由，甚至因不守婦德、敗壞倫理綱常，而被判處死刑。所以，民主只是少數人的民主，奴隸主的民主。在統治者爲鞏固其政權而編制的金字塔似的等級秩序中，女性永遠在底層，是永遠脫離不了奴性的奴隸。關於如何使國人成爲健全的現代公民，魯迅的秘密武器是「立人」和「吶喊」，這既是魯迅切身的生命體驗，也是病態社會中對不幸民眾的唯一救治方法。張恨水筆下的奴性是一種集體無意識的心理痼疾，男人是女性的經濟支柱，婚姻是女性的最好歸宿，這在女性深層意識裏已經紮了根。張恨水注意到了「寄予宗法制內部的市民價值觀如何供給女性以維護自我利益的某種觀念性資源，使她們在面對『屈抑』的現實生活時，不是完全地被動服從，而是做出某種主動的選擇。」²⁵這是日常生活背後「無聲的威脅」，張恨水以反高潮的筆法，通過獨特的書寫形式，闡釋了如何建構女性意識，建立女性主體地位，進而幫助女性擺脫淪爲奴隸的命運，爲他們找到一條新的出路。

²⁴ 魯迅：《墳·燈下漫筆》，《魯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頁224。

²⁵ 傅建安：《20世紀都市女性形象與都市文化》（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214。

徵引文獻

(一) 專書

王瑞：《傳統與現代的徘徊——魯迅胡適文化心理比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

孔慶東：《超越雅俗》，重慶：重慶出版社，2008年。

林樹明：《多維視野中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

李小江：《女性／性別的學術問題》，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

李澤厚：《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

李玲：《中國現代文學的性別意識》，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

汪暉：《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

梁啟超：〈論女學〉，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變法通議》，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

張恨水：《春明外史》(上)，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1993年。

周憲：《超越文學——文學的文化哲學思考》，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

孟悅、戴錦華：《浮出歷史地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
1999年。

魯迅：《而已集·小雜感》，《魯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

魯迅：〈傷逝〉，《魯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

魯迅：〈墳·燈下漫筆〉，《魯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

魯迅：〈南腔北調集·關於婦女解放〉，《魯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

魯迅：《集外集拾遺補編·破惡聲論》，《魯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

薛熹禎：《現代與傳統視域中的雅俗之辨——魯迅和張恨水》，北京：北京大學博士論文，2014年。

傅建安：《20世紀都市女性形象與都市文化》，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年。

葉聖陶：《過去隨談》（1930年10月29日），見劉增人、馮光廉：《葉聖陶研究資料》，北京：北京十月出版社，1988年。

戴錦華、孟悅：《浮出歷史地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

〔美〕許烺光，薛剛譯：《宗族·種性·俱樂部》，北京：華夏出版社，1990年。

（二）期刊論文

朱國華：〈論雅俗文學的概念區分〉，《文藝理論研究》第4期，1996年8月，頁6-14。

胡適：〈易卜生主義〉，《新青年》第4卷第6號，1918年5月。

范伯群：〈俗文學的內涵及雅俗文學之分界〉，《江蘇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4期，2002年12月，頁33-39。

馮奇：〈服從與獻身——魯迅對中國女性身份的批判性考察〉，《魯迅研究月刊》第10期，1997年10月，頁27-33。

劉思謙：〈中國女性文學的現代性〉，《文藝研究》，第1期，1998年1月，頁90-101。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